

毛泽东与《国民运动丛书》书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 唐见林 整理

《国民运动丛书》书目(以下简称《丛书》书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同志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为编撰《丛书》而亲自拟定的一个书目。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很重视我党的宣传工作,注意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和教育群众。他在湖南主编过《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新湖南》周刊,和在自修大学主办《新时代》月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继续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三大”后,曾担任《向导》报的编委。在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国民党右派怎样破坏革命内部的统一战线,毛泽东仍然坚持这一方面的宣传工作,扶助和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和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右派,牢牢地掌握我党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毛泽东同志即开始从事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亲自主办国民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对当时来自国民党右派的进攻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同时,利用他的合法身份,积极从事我党发动民众的各项宣传工作,大力促进国民革命。其中,有一项至今还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工作就是计划编印《国民运动丛书》。

(一)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从而把国民党由一个原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改造成为有共产党员参加,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结合的民主革命联盟。尔后,我党利用

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大好时机,公开组织和大力发展工农运动。直到国民党“二大”以后,中央党部主要领导职务仍然几乎全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因此反动宣传也格外猖獗。

在国际,帝国主义分子首先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反动口号,公开号召在国内的反动势力向改组后的国民党进攻(见《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1926年4月,第75页)。在国内,各派大小军阀势力也一致起来共同镇压统一战线形成后的国民革命运动。他们在国内大办报纸,实行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政策。国民党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工作(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3页)。不仅如此,国民党右派又从理论上进一步曲解和反对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其国民党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敌人戴季陶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反动小册子,公开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学说,破坏国共合作。尤其是他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危害极大,影响甚广,“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反共的共同思想武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81.10.第11页)。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对内宣传教育训练也极感迫切,供给下级党部学习的各种宣传材料有待收集,同时需要向全国民众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思想教育,而以往教育只注意“市民”,忽视“通民”,仅限于一般“文字”宣传,缺少“图书”(见《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1926年4月第75页)。

因此,为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

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以求贯彻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宣传决议案”，唤起民众，早日实现“先总理的遗志”。值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特向大会提议并亲自拟定了《丛书》书目，制定了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国民运动宣传教育的《丛书》编纂计划方案。这对于提高全国民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势力，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右派，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二)

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于5月19日亲自拟定计划编印的《国民运动丛书》书目（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第五日第五号》）。在计划编纂的《丛书》中，毛泽东首先提出：“变更编纂方法”，将原“设置固定人员辑纂”改为“审定题目分别征稿”。邀请在上海的知名学者和“专家”撰著，并在当时国内知识界要地——上海设立征稿处。“为搜求材料和特约撰稿以及排印推销之便”，还决定在上海增设“丛书编纂事宜驻沪办事处”，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委派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负责“征集丛书的稿件”（同☆）。

《丛书》包括六十种著作，分五辑出版，每辑十二种。每种书的字数至少八千，最多一万二千，《丛书》的个别著作还可分册编辑出版。毛泽东在“计划编印国民运动丛书”及“编辑国民运动丛书方法”中指出：《丛书》“无价发给党（国民党）员”外，同时还发放各省，并“以最低廉的价格推销于全国”。毛泽东还对《丛书》的印刷、份数、费用等等编辑方法，作出了十分具体的十条规定（同☆）。

其中，在《丛书》编辑方法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丛书》的性质应分为“(1)

国际政治经济 (2) 世界革命运动（包括农民运动）(3) 本党主义及策略 (4) 苏俄研究 (5) 国内政治经济及各种民众运动等五种”（同☆）。毛泽东强调指出，不一定要“依照原书目”编辑，但要根据实际情况，“择其目前最需要者先行编辑”。而每一辑中都要包含以上“五种性质的书各一二册”（同☆）。毛泽东关于《丛书》性质的划分和所体现的编纂原则，对于确定《丛书》的选材范围，编排方法和组织结构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就是《国民运动丛书》书目分辑拟编题目的编排顺序：

第一辑

(1) 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 汪精卫著
(已有)

(2) 中国近百年史略 (待编) 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不宜纯记政治成为一姓家传

(3) 十九世纪欧洲之政治问题 (待编)

(4) 产业革命 (待编)

(5) 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

此有一书可以依据原书为俄人某所著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解释过去历史原为一本世界史略今拟分为三册分题三名则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题曰：“世界史略之一”

(6) 妇女解放运动小史 (待编)

以德国 Ebel (培培尔) 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为蓝本

(7)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待编)

(8) 革命 (待编) 此为美国文学家 Jack London (杰克·伦敦) 所著之短编(篇) 小说极为有名

(9) 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 (待编)

(10) 德国大革命之意义 (待编)

(11) 世界之农民运动 (一) (待译) 此种总名一个其中实为国别

(12) 二七运动始末记 (待编)

第二辑

- (1) 中国国民党之使命 (待编)
- (2) 世界大战后之初十年 (待编)
- (3) 社会主义与宗教及艺术 (译)
- (4) 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待编)
- (5) 从中古自由市 (民) 至产业革命 (世界史略之二) (待编)
- (6) 土耳其国民革命 (待编)
- (7) 苏维埃制度 (译)
- (8) 苏俄之外交 (译) 俄外交总长姬采 (杰) 林原著
- (9) 世界之农民运动 (二) (待编)
- (10) 鲁示 (尔) 占领与道威斯计划 (待编)
- (11) 黑种人之革命运动 (待编)
- (12) 五卅惨案之前后 (待编)

第三辑

- (1) 孙文主义
- (2) 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译)
- (3) 劳动运动之开始至俄罗斯社会革命 (世界史略之三)
- (4) 华盛顿会议后之国际形势 (待编)
- (5) 革命的文学 (待编)
- (6) 欧洲保安公约之分析 (待编)
- (7) 资本的集中与中产阶级之消灭 (译)
- (8) 世界之农民运动 (三)
- (9) 苏俄的教育 (待编)
- (10) 红军 (待编)
- (11) 犹太民族解放运动 (待编)
- (12) 摩洛哥战争 (待编)

第四辑

- (1)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待编)
- (2) 洛迦诺会议 (待编)
- (3) 巴黎公社 (待编)
- (4) 五一劳动节 (待编)
- (5) 马克思 (思) 论东方民族革命 (译)
- 此共著论文三篇极关重要
- (6) 苏俄的艺术 (待编)

(7) 世界农民运动 (四) (待编)

(8) 埃及 (民) 族解放运动 (待编)

(9) 叙利亚战争 (待编)

(10) 将来之国际大战 (待编)

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 (伏) 龙斯 (芝) 之论文

(11) 一九一七年匈牙利社会革命失败史 (待编)

(12) 反动势力下之巴尔干 (待编)

第五辑

- (1) 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待编)
- (2) 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 (待编)
- (3) 三八国际妇女节 (待编)
- (4) 资本主义下之战争与和平 (待编)
- (5) 法西斯帝 (蒂) (待编)
- (6) 墨西哥革命 (待编)
- (7) 波斯问题 (待编)
- (8) 莫索尔油矿 (待编)
- (9) 英美在国际之利益冲突 (待编)
- (10) 大战后之世界妇女运动 (待编)
- (11) 殖民地最近的革命运动 (待编)
- (12) 裁减军备会议 (待编)

除以上六十种书目外，在毛泽东领导的宣传部宣传委员会提议下，又增补下列四种待编书目，即：

凡尔赛条 (约)

国际联盟

中国农民问题

中国职工运动

(同☆)

从以上六十四种书目可以看出，一方面，毛泽东在从事新民主主义的宣传中，大力宣传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解放运动；另一方面，毛泽东仍然坚持宣传十月革命，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不失时机地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因而，《丛书》在编纂体例上，就显示出其独特的风格。

(三)

首先，这五辑《丛书》，每一辑几乎都把宣传孙中山及其所倡导的三民主义，解释国民党的策略放在首位。并且，着重介绍国际政治经济和世界革命运动。

第一，介绍三民主义及其策略。《丛书》第一辑第一种首先列举《中国国民党史概论》。这本书原来是汪精卫（他当时还暂时是国民党左派）的一个讲演。1925年12月，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把他的讲演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汪宣传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把它编入《丛书》作为党（国民党）内外的宣传教材，在当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积极和进步意义的。但他的其它主张，并不都是与我们党相一致的。其它，如第二辑第一种的《中国国民党之使命》、第三辑第一种的《孙文主义》，也是把宣传三民主义及其策略放在首位。这都体现了国民革命所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策略。

第二，介绍国际政治经济和世界革命运动。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了大量的工作，他把记录当时在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各国爆发的革命运动的有关资料都加以蒐集，整编成册。

在介绍国际政治经济方面，毛泽东首先在《丛书》第一辑中列举了《十九世纪欧洲之政治问题》，在其它各辑中也都一一加以选编介绍。如第二、三、四、五辑及增补书中列举的《世界大战后之初十年》、《华盛顿会议后之国际形势》、《鲁尔占领与道威斯计划》、《欧洲保安公约之分析》、《洛迦诺会议》、《英美在国际之利益冲突》、《凡尔赛条约》、《国际联盟》等等。

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并未太平，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重新瓜分世界。1919年6月，有英、法、美、意、日等国与战败国德国在巴黎凡尔赛签订的重

新瓜分世界的《凡尔赛和约》；1920年1月，有新产生的标榜为“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再分割大开方便之门的“国联”；1924年秋季，美英在伦敦又继续共同策划新的反对欧洲和亚洲人民的阴谋，即“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曾在“四大”宣言上，遭到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强烈而严厉的指责。1925年12月，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在英国伦敦正式签字并通过了由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所讨论的《洛迦诺保证公约》，企图纵容德国继续向东方侵略。实际上这是道威斯计划在政治上的继续。通过这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形势方面的介绍和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揭露，无疑，它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眼界，认清世界的政治形势，不再对帝国主义抱有任何幻想。而且，为了使中国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提高警惕，在《丛书》书目中，毛泽东还特意编进《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并准备分上中下册出版。

在介绍世界革命运动方面，毛泽东所作的工作仍然是巨大的。在《丛书》书目中，宣传和介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所占的比例也是最大，占有突出的地位。现在，我们从书目中可以看到的散见在各辑中的有《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德国大革命之意义》、《土耳其国民革命》、《黑种人之革命运动》、《犹太民族解放运动》、《摩洛哥战争》、《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社会革命失败史》、《巴黎公社》等等。通过宣传和介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革命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了，它已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且，这对于增强中国人民的革命信心，坚定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同时，还可以从《丛书》中吸取各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

所取得的经验教训。

在介绍世界革命运动中，《丛书》还特别注意介绍工、农、青、妇的运动情况。如介绍工人运动的有《五一劳动节》；介绍妇女运动的有《三八国际妇女日》、《妇女解放运动小史》、《大战后之世界妇女运动》；介绍农民运动的有编入各辑中的《世界农民运动》（一）（二）（三）（四）。

其次，《丛书》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第三辑第二种的《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译）、第四辑第五种的《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译），并且在这条目录后加以注释，特别用“极关重要”来说明本书的重要性。这说明运用马列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同样，《丛书》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各个学科领域的论述也广为收集。如《丛书》书目中的《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主义与宗教及艺术》。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方面，有《苏维埃制度》、《苏俄之外交》、《苏俄的教育》、《苏俄的艺术》、《红军》。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我党一方面从事国民运动的宣传工作；一方面坚持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毫不妥协地打起自己的旗帜，果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正是《丛书》的独到之处。

最后，《丛书》书目注意介绍国内政治经济及各种民众运动。在介绍国内政治经济方面，有《中国近百年史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在介绍民众运动方面，有《中国农民问题》、《中国职工问题》、《二七运动始末记》、《五卅惨案之前后》、《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现实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将唤起广大劳苦大众，担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

在《丛书》的编纂体例和对材料的精选上，毛泽东不仅注意到从理论到实际，从历史到现实，而且强调从实际革命运动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从这六十四种书目中还可以看到，这部类似“百科全书”的《丛书》书目，它在内容的选择和书目的组织、编排上，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益的经验。

（四）

《丛书》书目在编纂方面所体现的这些特点对我们今天的工作给予极大的启示，其中部分思想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体现在《丛书》书目中的科学性原则。毛泽东在计划编制这套《丛书》时，不是运用某一门具体学科的知识，而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际出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宇宙观来观察和分析世界，对事物的发展作出客观的判断，从而制定相应战略部署，以推动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亲自拟定的《丛书》书目本身，就是极为重视它的科学性的明证。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民运动丛书》书目中，凡是涉及到国民革命运动的重大内容，对国民革命有指导作用或直接、间接地对国民革命产生影响的事件，几乎在《丛书》书中都有反映。而且，这部《丛书》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丛书》每一辑对材料内容及主题都加以严格的筛选，并把它加以科学的编排，因而使得《丛书》“有理论有政治问题有历史有政治报告皆循序而进”，（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第五日第五号》）成为一套既完整又系统的《国民运动丛书》。同时，由于《丛书》书目反映了国民革命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与我们党所制定的最低纲领也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上，它对国民革命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革命性的原则在《丛书》书目中

的体现。书目在编纂体例上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革命的。这首先表现在《丛书》书目中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并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当时，面临国民党右派的猖狂反扑，在我们党内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想。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放弃我党在民主革命运动中领导权，一切听从国民党的指挥。毛泽东在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期间，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尽管在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从国民党内部打击、排挤共产党人之后，毛泽东依然坚持我党发动民众的各项宣传工作，把民主革命的文教宣传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在《丛书》书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作为《丛书》书目，它真正体现了国民运动的主体，把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编入《丛书》，这说明了工农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国民党是靠着我们党的帮助才使他“与工农发生关系”。这在《丛书》书目中也同样得到了应有的反映。

第三，在学习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体现在《丛书》书目中的战略性和策略性的原则。既然是一部《国民运动丛书》书目，它就应该以宣传国民革命为宗旨，但是怎样宣传，要不要以马列主义思想来指导，这仍然是个重大问题。在《丛书》书目中，我们看到，放在《丛书》书目各辑之首的几乎都是宣传国民党及三民主义，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都没有放到最前面，并且毛泽东还亲自指定《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孙文主义》这两本书，专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担任编写，可见我们党是把宣传国民革命放在首位的。但是，是不是完全回避国共两党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一方面，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大力从事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工作，帮助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另一方面，

毛泽东同志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求同存异，在《丛书》书目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适当加以宣传，这不能不说这是毛泽东运用战略性和策略性的原则在《丛书》书目中的具体体现。由于《丛书》书目产生在国共合作之际，因而具有很大的策略性。

此外，还应指出《丛书》所具有的普及性，在编纂计划和使用上都体现了这一点。由于它是针对当时广大的读者，在编辑中首先就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水平，便于社会各界人士阅读，加上篇幅适当，易于普及。

毛泽东准备编辑的这套既通俗又完整的《丛书》，在当时来说，体系是极为宏大的，它涉及了与当时革命运动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各个知识门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知识是多么渊博。就拟定这套《丛书》书目本身来说，作为一种政治书目，作为宣传一种革命学说的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指导国民革命运动的书目，它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确实是极为少有的。

可惜的是，这套《丛书》并没有完全编译出来，这个宏大的编辑计划，在当时革命形势发生急转的情况下，没有付诸实施。直到现在，我们也还不知道这套《丛书》究竟编译了多少。根据当时材料记载，绝大部分为待编或待译。《丛书》原准备“分约人撰预定约十人每人六题每月缴二题每月出版十二册”，这样就可以“于短时间内编印多数小丛书”。甚至毛泽东同志还设想继续编印第六辑至第十辑，打算将“第六辑至第十辑之书目”在六十种书“有人担任后再拟”。如果这套小丛书在当时可以按时编辑出版，那么，可以想见，这对于正处在革命运动高潮的工农运动，对迎接我党倡议的北伐，一定会起到极大的教育和推动作用。

整理发表本文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及傅也俗、金竞铭同志的支持和帮助。